

鲁迅与我

□【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 徐娟译

我初次听说鲁迅是在60年前。那是1953年，我刚开始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汉学与远东历史。但是鲁迅在捷克国家为人所知应该更早一些，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之前，因为1937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1906—1980）出版了他翻译的鲁迅的《呐喊》，并撰写了后记《鲁迅及其作品》。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对中国并没有太大兴趣。我是在奥古斯丁·帕拉特（1923—）教授的劝说下才致力于汉学的学习的，帕拉特是普实克教授的密友。我在布拉格学习的5年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处都可以找到有关鲁迅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中国研究系里有，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位鲁迅研究专家贝尔塔·克莱布索娃（1909—1973）教授的私人图书馆里也有。

在斯洛伐克问世的第一部鲁迅作品的翻译名为《白光》，1952年由斯洛伐克文化协会在马丁出版。《白光》由费德林（1912—2000）作记，是由两位斯洛伐克译者Ján Frička和Eduard V. Tvarožek从各种俄语和世界语版本的鲁迅作品翻译所转译而来，包括《呐喊》中的8个短篇小说、《彷徨》中的3篇小说以及《野草》中的4首诗，除此之外并没有收录鲁迅的其他作品。他们对鲁迅短篇小说的选取主要遵循费德林的建议，但是在《野草》4首诗的选取上却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因为这个领域还没有“权威”的苏联专家涉足。

直到1960年，又一本鲁迅的作品选才以斯洛伐克语在斯洛伐克问世，这也是最后一本。该书名为《火与花》，由克莱布索娃教授的学生——斯洛伐克汉学家（1935—1992）博士翻译，布拉迪斯拉发的出版社出版。在我看来，这本书更忠实于原著，小说选取更佳，克莱

布索娃的序言也比费德林的后记更令人可信。在这本书中，除了同样选取了《呐喊》《彷徨》和《野草》中的部分内容之外，还增加了第一本译著中所没有收录的《狂人日记》《朝花夕拾》中的5篇文章以及《故事新编》中的《奔月》一文。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奔月》就价值论而言并不是鲁迅最成功的故事之一，为何入选这本译著着实让人费解。

在我读大学的5年期间，我在布拉格图书馆大量阅读了有关鲁迅的作品和资料，还经常去克莱布索娃的家中与她探讨鲁迅这个她最喜爱的作家。我写的第一篇有关鲁迅的短文题为《鲁迅—青年之友》，于1956年9月20日发表于斯洛伐克青年报刊《变革》，彼时正值鲁迅逝世20周年。这一天后来也成为我学术之路的开端。

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阅读的第一本鲁迅的原著是《故乡》，那是1954年，之后的几年里我阅读和研究的更多的是茅盾的作品，主要是他的小说以及关于他的书籍和文章。那时在捷克斯洛伐克，除普实克和克莱布索娃外几乎没有人能写鲁迅，而我的那篇短文则是例外。

我从1971年起开始撰写一篇长文，题为《尼采在中国（1918—1925）》，探讨了鲁迅对尼采的态度。1982年，我的斯洛伐克语文章《鲁迅早期小说的文学间性（1918—1920）》中探讨了俄罗斯作家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1871—1919）、弗谢沃洛德·米哈伊洛维奇·迦尔洵（1855—1888）以及尼采对鲁迅明显的影响。1986年，我的第二部专著《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出版中译本分别于1990年和2008年出版），该书的第二章题为《呐喊：与迦尔洵、安德烈耶夫

及尼采的创造性对抗》。

1985年，我另一篇研究鲁迅的长文发表，主要探讨青年鲁迅及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文章分析了鲁迅从1901年到190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的文章，认为鲁迅教导人们要自强的“自树既固”思想牢牢地扎根于他在留日期间的整个存在和意识，体现在他发表第一篇文章《人之历史》时所用的笔名“令飞”上。“令飞”这个笔名可能来源于《创世纪1:20》，即“让雀鸟飞”。这种思想同样体现在他发表并未完成的《破恶声论》一文时所用的笔名“迅行”上，“迅行”一词暗指一头腿脚受伤的野牦牛，在与恶声的战斗中败下阵来，便垂头丧气，不再继续思考。

1986年10月17日鲁迅逝世50周年之际，德国波恩大学的顾彬教授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我在会上分析了《彷徨》中的一篇短篇小说，后来文章以《鲁迅的〈长明灯〉与迦尔洵的〈红花〉两部短篇小说的文学比较观》为题用中文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5期上。与迦尔洵《红花》中的狂人不同，鲁迅《长明灯》中的狂人全神贯注于“沉寂垂死”的中国的种种代表，是一个反抗的象征，但是由于其国家的封建思想，这种反抗无济于事。

2006年10月18日至19日，李夏德教授在维也纳大学举办了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的国际论坛，我有幸在论坛上读到了一篇名为《青年鲁迅及其伦理观》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对鲁迅留日期间研究的一个接续，尤其是对《破恶声论》以及《摩罗诗力说》这两篇文章的研究。

2012年11月8日至11日，我参加了由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论坛：北京论坛”，会议的主题为“世界鲁迅与鲁迅世界：媒介、翻译与现代性书写”。在会上，我宣读了《朱利乌斯·泽耶尔（1841—1901）和鲁迅（1881—1936）谈后羿：旧神化素在现代文学中的变化》一文，探讨了捷克作家泽耶尔和鲁迅的作品中有关后羿和嫦娥的传说。

今年我已年满80，我想未来鲁迅的研究还是更多地交给年轻一代吧。

（作者为斯洛伐克科学院教授，译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学院教师）

从“真的人”到“真的爱国者”

——我的鲁迅研究的经历与心得

□【韩】金彦河

对我来说，鲁迅还是一个费解的谜语。其人也是，其文也是。这是一种不幸又是幸运。对于鲁迅研究已付出了不少心血，把握依旧不很透彻，这让我感到忧郁与挑战；有的是研究课题，不用再为研究什么而苦闷，这令我感到欣慰和不满。

鲁迅的作品当中，最初给我莫大震撼的是举世闻名的《狂人日记》。当时我直观地感觉到，他的伟大与误解均可能起因于此，不过我无法说明其所以然。到了2001年，我才发表我的一些积累，即《〈狂人日记〉：寻找“父亲”》（《鲁迅研究月刊》231期）。我想，鲁迅基于自己也不是解脱于吃人欲望的“真的人”这一自觉，为了救救“孩子”（中国的未来兼无意识）挣扎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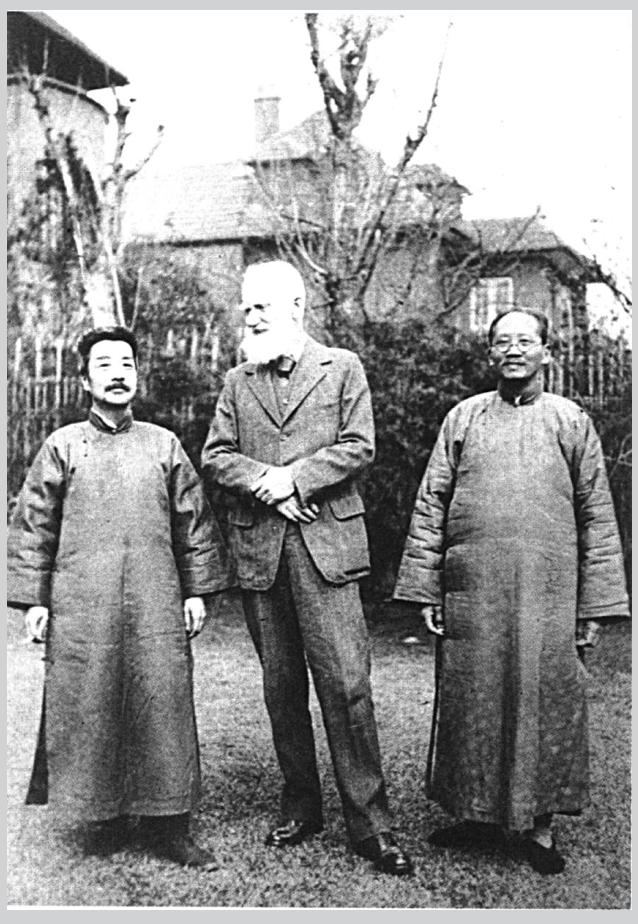
在此，不得不提到的是他的另一代表作《阿Q正传》。《狂人日记》看似难解，实亦不易；我认为《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是姐妹篇。2005年，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中国的鲁迅博物馆在沈阳共同举办了鲁迅研讨会，当时我发表的论文就是《〈阿Q正传〉：作为一种疯子的世人形象》。光看别人的吃人欲望的人可能不是真正的战士，只笑阿Q的疯子形象的人也不是真正的先觉。可惜，有很多人只知道批判别人是吃人欲望的“狂人”和被权力意志滑稽地驱使的“阿Q”，很少有人能看透“狂人”的致命弱点和“阿Q”的革命动力。如此看来，无论是战士还是世人，人的命运都不免是一把双刃剑。人的伟大与卑劣总是纠缠在一起的。

鲁迅对“真的人”、真的革命家、真的战士的不断追求贯穿了《狂人日记》以及他的一生。阻碍这些目标的，不管是人还是鬼，他都无情地加以抨击和蹂躏；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无论是一草一石，他都无限地加以珍惜和抚养。不过这样的一切奋斗和挣扎往往无法得到适当的承认和理解。我认为鲁迅的孤独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他的目标太高，他的洞见太深。我开始关注《野草》的一些散文诗，如《墓碣文》《这样的战士》和《影的告别》。显现于这些诗篇的恰似疯狂领域极端陌生的思想深度及艺术想象，是《野草》具备令人难解又震撼人心力量的根本原因。对于《野草》的难解和震撼力的根源，我从诗人（鲁迅）与世人（读者）的对立以及因而造成的荒诞美学的角度进行考察。2005年，鲁迅博物馆编辑和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里也有我的论文说明这种看法，题目为《鲁迅〈野草〉的诗世界：极端对立与荒诞美学》。在这篇论文里，我如此论述：“反讽性作品中说话人‘我’，接触了墓主的内心世界，惊讶于其致命又可怕的‘毒气和鬼气’撒腿就跑。可与他不同，我们被这些疯狂的真理和荒诞美学迷住，永无休止地看了又看《狂人日记》和《野草》。”

鲁迅极度厌恶连自己的儿子都想吃的“吃人的人”、比暴君更暴虐的“暴君的臣民”和“其中无物”的“一件外套”，以及诸如此类的世人可悲又可恨的存在方式；鲁迅坚决执著于不吃人的“真的人”、“看透了造化的把戏”的“叛逆的猛士”、在“无物之阵”中不断举起投枪而眼“无物之物”作对的“这样的战士”和诸如此类的战士可怕又荒诞的斗争方式。有的时候，我非常忧虑于自己是否属于鲁迅极度厌恶的这些人的范畴，有的时候，我又焦虑于自己能否执著于鲁迅固执的生存方式，这样看来，我的鲁迅情结可能是万难克服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大痛苦，又是一种大欢喜。

最近几年，我比较关注与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相当的韩国文化巨人丹斋申采浩（1880—1936）的思想与文学。丹斋与鲁迅这两位文化巨人分别代表着现代转型期的韩中两国思想启蒙与爱国独立运动，即韩国的三一运动与中国的五四运动。不仅如此，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潜力还未被充分认识，依然富有极高的研究价值。2009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丹斋与鲁迅的思想比较：韩国三一与中国五四的代表思想》，集中讨论作为“中国民族魂”的鲁迅与作为“青邱的正气”的丹斋所具有的相同性和不同性。他们同样是为开拓各自民族的生存血路而奋斗一生的文化巨人，但由于国情和个性的不同，他们的思想的重点和现代化策略不免各不相同。今年6月，在韩国举办的国际鲁迅论坛上，我有幸发表了关于丹斋与鲁迅的比较研究论文，其题目为《鲁迅的〈狂人日记〉与丹斋的〈梦天〉比较研究：以作者精神再生为中心》。鲁迅与丹斋他们各自的身世和作品在社会上的遭遇迥然不同，但同是经历了一种精神再生过程。我认为，他们所产生的最后觉悟分别是自己也不是“真的人”和“真的爱国者”，但这些觉悟的共同性确是耐人寻味的。他们都远远超过了废除封建社会并建立现代社会这一时代转型使命，因为他们的目标决不停留于单纯的社会学和独立民族国家。他们的目标的确高远，他们的观点的确深邃。因此，我注定将无法从鲁迅与丹斋情结中得到解脱。

（作者为韩国釜山东西大学汉语系教授、孔子学院院长，中国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鲁迅、萧伯纳、蔡元培于1933年2月17日在上海合影

鲁迅在英国的近期传播

□【英】王维群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社会各界加速了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研究，海外“新汉学”蓬勃兴起。英国对整个中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和发展，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鲁迅的形象与知识传播在英国的这新一轮的“中国热”中得到拓展与加速。

英国学术界在鲁迅译介的近期发展的主要标志是2009年英国企鹅出版社经典文学部出版的蓝诗玲（Julia Lovell又译作朱丽叶·洛维尔）重译的鲁迅小说全集。在这本叫《阿Q正传及其他故事：鲁迅小说全集》（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的书中，除了前言等共416页的内容，书中完整翻译了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3本小说集。蓝诗玲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为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分校历史和考古系的高级讲师，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学和历史都很研究，她此前也翻译了张爱玲等其他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曾经写过一些对文体和讽刺等文学修饰手法的文章。企鹅出版社是英国文学的权威出版社，其出版品是真正针对英美大众广泛读者群的。这次对鲁迅的译介，是英国21世纪高水平的英语母语者将鲁迅向广大英国知识界及普通大众的再次介绍。蓝诗玲译本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即这是一个由英国本土高级知识分子以地道的英式英语译鲁迅的当代高质量译本。她借鉴了前人的成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当代风格。蓝诗玲的鲁迅小说全集译本出来以后，英国境内中国研究界的各位同仁的高度评价了该书，认为它是一本及时、高质量的关于中国研究的藏书。英国文学权威出版社企鹅出版社这次出版重译鲁迅的小说全集一事，充分说明了鲁迅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

鲁迅研究在英国学术界继续受到关注，如剑桥大学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苏文瑜博士（Dr Susan Daravala）目前正准备用康德美学去分析李长之对鲁迅的批判。她目前正指导的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鲁迅与20年代的中国文坛》。在英国的大学，鲁迅的传播也有所发展，有很多大学中文系或者中国学研究机构，所授课程中以不同方式、不同分量涉及到鲁迅及其作品。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十多个英国顶尖大学的课堂里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鲁迅。总体而言，英国大学里凡是提到中国五四运动那个时代的课程基本上都会提到鲁迅。鲁迅是文学家、翻译家、革命家、思想家，他的多面角色，决定了他在这些方面的课程中被提及、学习和研究。因为鲁迅的作品是中国作家中被最好的和最全面的翻译成英文的，鲁迅在英国是能够被最广泛和最方便获得其作品的中国作家，所以无论是历史、文学、哲学还是文化课，只要涉及五四时期，都会学习鲁迅的作品或者把他作为参考阅读的内容。汉语课着重学习语言和文字；文学课着重分析鲁迅的写作和风格；历史课和社会学课把鲁迅的小说当作历史文献资料读，因为鲁迅的现实主义写法，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面貌；哲学课读鲁迅，着重看鲁迅的语言文字及研究白话文——现代汉语的开端。在英国大学中，有些翻译课上也有鲁迅的翻译理论和材料的出现。

此外，鲁迅的形象和影响还表现在一些社会文化活动方面。如在大英博物馆曾举办出售其木刻等民间文化活动，伦敦大学政经学院（LSE）在它的一个与北大联合办学的课程介绍主页上放了一张当年肖伯纳访问中国时与鲁迅及蔡元培的那张合影，用以说明伦敦大学政经学院与北大和中国之间的源远流长。鲁迅的传播还表现在英国的主要书店Amazon、Waterstone、WHSmith及其网站上均出售鲁迅著作及有关鲁迅研究的著作，中英文的都有。除此之外，在英国还可以买到外语出版社（外研社）出版的鲁迅中英文作品。鲁迅在BBC等英国网络和媒体上广泛存在。鲁迅的名字出现在BBC及英国报纸等网页上的关于文化、文学、经济、政治、英语学习和介绍中国等各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中对鲁迅的地位介绍或评价都极高。

总结一下在英国媒体中的鲁迅形象，大致被描述为以下的情形：1. 鲁迅是狄更斯和乔伊斯的合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2.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3. 鲁迅是五四时期最多产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评论通常是负面的但却是现实的，并且是残酷的、中肯的。尽管这样，他却从来不是卖国贼，而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鲁迅揭露了中国人爱面子的痼疾，那种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却依旧对过去骄傲，对强权不加思索的承受。4. 鲁迅是伟大的小说家。鲁迅的作品已经深入媒体人的心，经济领域的人也在引用鲁迅创作的铁屋子等文学形象。5. 鲁迅是短篇小说家、散文家、有影响力的批评家，鲁迅在民众中的形象，他是个共产主义者，跟斯大林很相像。6. 鲁迅就是中国作家的代表。鲁迅代表了中国。在英国媒体眼中，鲁迅之于中国，就如托尔斯泰之于俄国、巴尔扎克之于法国、保罗·科埃略之于巴西等，鲁迅是中国最著名的代表性的现代作家。7. 鲁迅是中国最反叛和最有才的作家和文学家。他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和《药》等成为种子一样的能发芽生根的作品。

总之，在21世纪的英国，鲁迅传播趋势正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在学术圈里普及，并由纯学术殿堂逐渐走向民间。

（作者为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师、博士）

越南鲁迅研究——历史与现状

□【越南】阮氏明商

伟大的中国作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已经从中国大地走出来，成为了受人尊崇的、世界的文豪。在越南，鲁迅也被视为一位最杰出的中国作家，受到越南读者的热烈欢迎。迄今，鲁迅的全部作品都被翻译成了越南语；同时也有许多规模不同的越南研究者从事对鲁迅的研究项目。

偏重于社会性、阶级性的研究阶段

1945年越南革命成功之前，鲁迅研究的代表性成就是由邓台梅撰写的《鲁迅——身世与文艺》。在此著中，邓台梅广泛地介绍了鲁迅的生平、作品与风格特点，指出鲁迅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其文风尖锐、刻薄、冷淡，但其在文章里面隐藏着一股热血的情感。可以说，《鲁迅——身世与文艺》在越南是第一篇关于鲁迅的专论。邓台梅是第一位给越南的鲁迅研究事业奠定基础的学者。从总体上可以看清，邓台梅已经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研究鲁迅。

1945年之后，“八月革命”成功到1986年越南走向改革开放事业之前的这段时期，由于时代的需要，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强烈影响之下，在越南，这个阶段的鲁迅研究偏重于挖掘其作品中的阶级性、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当时，对越南来说，越是传播鲁迅作品中的战斗性、批判性越是有助于培养越南人民的战斗精神。越南研究者研究鲁迅的主要目的是指出鲁迅作品是服务革命的一种精神武器，注重于鲁迅作品的社会功能、斗争价值。文波学者的《读〈故事新编〉》（《文学杂志》1961.4），胡玉学者的《读〈呐喊〉》（《文学杂志》1961.9），黎春武的著作《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1958年，文化出版社），阮伍的《阿Q正传的典型意义》（《文学杂志》1964.10），芳橘的《鲁迅——文学理论家》（1977年，大字与专业中学出版社）等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

法的代表研究。

总之，从1945年8月以后到1986年越南走进改革开放之前的阶段，在鲁迅研究方面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这个时期，文学研究脱离文学本质很远，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本质和艺术性，有的甚至陷入庸俗社会学的错误。

偏重于本体论的鲁迅研究的阶段

1986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文化政策的开放，越南文学理论进行了第一次伟大转变，向文艺学语言论、本体论转变。它打破了长期越南文学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以改革开放的姿态，改变了整个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向。在新背景之下，鲁迅的研究也转变了研究方向。

改革开放之后的鲁迅研究者用新的外来文学理论发掘其作品的形式审美。在陈庭史教授提倡的文学本体论的影响下，鲁迅研究也开始发生转变。这个时期，越南的鲁迅研究跟中国的鲁迅学是同一的，都号召“回到鲁迅本身”，而不是以鲁迅的作品来阐释毛泽东的艺术思想。因此，越南1986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接近鲁迅作品的新鲜倾向，特别是注重小说的艺术方面，如小说结构、叙事艺术、人物塑造艺术、艺术空间时间等。

本体论研究的代表成果有《鲁迅小说的内在价值》（黎辉焦的博士论文，1988年）、《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陈黎花筝的博士论文，2006年）、《鲁迅叙述艺术——读〈呐喊〉与〈彷徨〉》（阮氏梅政的博士论文，2008年）、《梁维恕的〈鲁迅小说中的陈述人物的形象〉》（2011年《文学杂志》第10期）等。

总之，本体论的鲁迅研究主要关注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它弥补了前阶段偏重社会性、阶级性研究的不足，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鲁迅与越南的比较文学研究

除了上述两种研究倾向，还有一部分研究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鲁迅著作。可以提到的代表性专著有陈黎宝的《维克多·雨果与鲁迅作品中的穷困者》（《文学杂志》2002年第6期）、陈黎花筝的《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到鲁迅的〈伤逝〉》与《重看一些西方思想对鲁迅的影响》等。不仅将鲁迅与世界作家相比，越南研究者还将鲁迅与越南现实批判主义优秀作家南高相比。鲁迅与南高之间的偶然相同已经成为诸多学者的研究题材。代表性研究是范秀珠的《志飘与阿Q的一些比较》（《文学杂志》1992年第1期）。但是从比较角度研究鲁迅与南高，只能采用平行比较方法，因为迄今，越南研究界还没找到南高受到鲁迅作品影响的证据。

结语

从总体上看，越南对鲁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从身世、人格、文学事业到艺术观点、思想、艺术手法。可以说，越南鲁迅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从历史角度来看，每个阶段的鲁迅研究的差别都反映了越南鲁迅研究的变动。虽然得到一定的成果，但是越南鲁迅研究的选题还不丰富，重复性较高，有时候还陷入单纯作品欣赏。为了继续发展越南的鲁迅研究，越南文学研究界要了解世界与中国目前的鲁迅研究现状，然后根据越南的国情、越南文学的特性、越南读者的接受情况来研究鲁迅。

（作者为越南河内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学系讲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